

# 论唐君毅的文学观

熊吕茂

(中南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并将中国文学分为八大类; 同时, 他还认为文学与历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只有对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作一比较, 才能了解文学意识的本性; 而文学意识的价值意义则体现在其真、善、美三者的结合上。他在对中西文学之比较中, 虽然习惯于用本民族的文学标准去观察和评判西方文学, 不免带有文学评判价值上的主观片面性, 然而他的文学观却有着独到的理论创新、理性判断和审美情趣, 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关键词: 唐君毅; 文学观; 中国文学; 西方文学

中图分类号: B2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5-0818-06

唐君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人文精神为己任, 从事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宣传, 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 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君毅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 涉及到人生、伦理、道德、哲学、宗教、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 本文拟就他的文学观作一粗浅的探讨。

## 一、中国文学之种类

唐君毅认为, 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中国哲学以儒道二家为主流, 佛家可与道家合为一类。儒道二家都讲生化, 但我们可说儒家所长者, 偏在讲生; 道家所长者, 偏在讲化。生是相继相续, 此是生命之韵律之来复; 化是转易变化, 此是生命中之韵律之转变, 合以成生命之节奏。”<sup>[1](273)</sup>中国文学从内容上看, 亦可说或受儒家之影响, 或受道家之影响。故受儒家影响之中国文学多善于表现“生”之情, 而以性情胜、气象胜; 受道家影响之中国文学多善于表现“化”之意, 而以神韵胜、胸襟胜。为此, 唐君毅将“化”之意与“生”之情的中国文学分为以下八类:

其一, “超尘俗以自化于自然”<sup>[1](273)</sup>的文学。唐君毅认为, 这一类文学属于道家思想的形态。他举例说, 如陶渊明虽有儒者之心情, 但更富于道家的心情,

他“所作的田园诗, 就多是表现为道家型的超尘俗的精神, 而自化于自然的心情者”<sup>[1](274)</sup>。像他写的“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白日掩荆扉, 对酒绝尘想”;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啸傲东轩下, 聊复得此生”等诗, 都是归于田园家居的生活下写出来的, 都表现出一种由尘俗中超拔或化除种种尘想以返于自然的心情。

其二, “化自然物之质实以归于虚灵”<sup>[1](274)</sup>的文学。唐君毅认为, 这一类文学亦属于道家思想的形态, 它重在将一一质实之自然物化于空灵的意境中。如在王维之“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钱起之“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苏东坡之“时见幽人独往来, 飘渺孤鸿影”等诗词中, 诗人都将实在之人化为一声音、一影子、一似有还无的东西, 这就是一种空灵的意境。

其三, “取美化之自然物与人物以入文学”<sup>[1](275)</sup>的文学。唐君毅认为, 这一类“道家型之文学不仅擅于化质实之物, 以归于空灵, 而且亦最善于取本来善化之人物以入文学”<sup>[1](275)</sup>。如云、水、花草、鹤鸿等都是自然界中本来善于变化往来的东西; 高人逸士, 侠客神仙, 居无定处, 行无定踪, 是善化的人物, 这些都是道家型文学的题材。

其四, “将人间惊天动地之历史化入寂天寞地”<sup>[1](275)</sup>的文学。唐君毅认为, 这一类文学也是属于道家型的文学。如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亦把无数惊天动地之好汉, 在一梦中加以收束即是善化。再如《庄子》

所说“参万岁而一成纯”，亦将包括历史中一切复杂喧嚣之事物，皆可化归纯一，而归于虚无寂寞的意思。

其五，“赞美人之自然生命之延续之文学”<sup>[1](276)</sup>。唐君毅认为，“这类文学，乃表现人对自然生命之‘生’的本身，加以赞叹赞美的诗文”<sup>[1](276)</sup>，属于儒家型的文学。像《诗经》中之《大雅》、《颂》等赞美祖先之长寿以及子孙之众多均属对自然生命之“生”加以赞美的诗文。又如《既醉》中之“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此皆系儒家重视人生思想之本原，亦为后来一切庆贺颂美的文学之本原。

其六，“体验人与自然中之生意相通之文学”<sup>[1](276)</sup>。唐君毅认为，这一类文学亦属于儒家型的文学，“是指从人自己之生命与自然界之生命之相感，而生意相通，有所寄意之文学”<sup>[1](276)</sup>。像朱子尝称道石曼卿之“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亦因其所表现之思想正为儒家之物我之生意相通之思想。可见，中国一切表示天地之化机与生机之诗，皆属此类。

其七，“从人现在之生命与往古或过去生命相通所成之文学”<sup>[1](277)</sup>。唐君毅认为，这一类文学也属于儒家型的文学。在他看来，“人之怀古今旧等，并非只是留恋过去，而是要成就一现在生命与过去的往古的世界之相通，使我们更认识一生生相续的世界之存在，此亦即由儒家所谓尚友千古、不忘故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发展而来。”<sup>[1](277)</sup>如孟浩然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诗词，即是所谓人现在生命与往古或过去生命之相通的情感宣泄。

其八，“个人之生与他人之生相感相生之文学”<sup>[1](278)</sup>。唐君毅认为，“‘生’可指我们自己个人之生，亦可指我与他人相感相通之生。如人在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等伦理关系中相通相感之生。由此而中国有很多表现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之情之文学。”<sup>[1](278)</sup>而此种文学也是表现儒家思想的文学。如《旧题苏武诗四首》之“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疑”是表夫妇之情；又如诸葛亮之《出师表》，亦兼表现师友之情与君臣之情；再如杜甫之诗中，即充满了各种之情之表现，而此各种之情又互相错综，相依相结，以增其情之蕴结的强度。在唐君毅看来，此种把不同的情加以贯通起来的表现法，乃依于一类之情可引生他情。此种情之相生，尤为儒家文学之所重。

## 二、文学意识之本性

唐君毅认为，文学与历史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文学作品同时包涵历史人物与事迹的叙述和

记载，而最初的历史著作亦兼具文学性。如中国《诗经》之《雅》《颂》即为对历史人物的颂赞以及对各历史时代政教之废兴的叙述。又如在西方，文学则源于荷马之《史诗》，希腊之戏剧初亦为历史故事之说唱。

在唐君毅看来，文学之所以与历史关系密切，乃在于文学之抒发情志必对具体之事物而抒发，一具体之事物初恒存在一历史之时代与地域。“而历史上之事物之为人视为富有意义，值得加以记载者，亦必为能感动人之情志者；因而人亦乐于以文学之文，一方记载其事，一方抒发其情。”<sup>[1](216)</sup>然而文学与历史之意识又毕竟不同。历史上之人物事迹皆必先由文学家本其想象与情志加以渲染、改饰或夸张，然后才能入于文学；而文学家心目中之史实，皆尽可为文学家之一心所虚构，故以文学中之小说戏剧为历史，其史必诞妄而不实。相反，而人若一本历史之真以为文学，则文学亦将枯燥而无味。“又历史家求往事之实，乃由今以上溯于远古，而文学家自言其怀抱，则意恒寄望于未来。史家之为文，宜归于朴而近真；文学家之为文，宜归于华而尽美。”<sup>[1](216)</sup>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文学与历史之差别。唐君毅认为，欲求文学与历史之差别，则宜先对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作一比较，才能了解文学意识之本性。

其一，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中之时空观念不同。唐君毅认为，虽然文学与历史皆以具体事物为其所叙述的对象，但在历史意识中，我们于一具体事物必安排之于一公共的时间之秩序中，使其在此秩序中有一确定的位置；同时连带亦将一历史事实安排于一公共的空间秩序或地理秩序中，亦于其中得一定位。因而一切历史事实皆为在某时某地所发生之一事实，而有其在公共的时空中之地位。而在文学意识中，则并不重将人所接触之人物事迹于公共的时空中求一定位。如小说戏剧作品所述之人物事迹之发展，其间诚有一秩序，而亦皆为安排于一小说戏剧内部之时空之中，然而此小说戏剧本身之结构却自成一独立之全体。此小说戏剧中人物事迹皆可为虚构，或一部分为虚构；则此人物事迹断然不能真视同曾存在于历史中之人物事迹，而安排之于一公共的时空秩序之中。此即与历史意识中之一切人物事迹皆在一公共时空中有其定位完全不同，此亦即小说戏剧中之人物事迹不同于所谓真实的存在于历史世界之人物事迹之根本理由所在。

其二，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中之时空定位不同。唐君毅认为，历史意识与一般意识所叙述的人物事迹在公共时空中恒有求其一定位。而文学意识“恒有超出历史意识及一般意识之时空之定位之观念，及时空观念之自身之趋向”<sup>[1](222-223)</sup>，这不仅是因为在一切文

学创作中,常有由文学家之想象而虚构之成分,而不能将事物安排于历史意识及一般意识中之统体的公共时空中而求其定位之故,而且更由于文学家在其创作时,其想象中所对之境相,无论为虚境或初为实境,皆为此想象之所摄,而一切文学之想象,皆有文学家之情志上之向往在后面推动之故。由此情志之向往,推动此想象,即同时将其所摄之境相向上拔起,而加以凸出,并加以持载。于是,此境相即必然与一般意识之公共时空中之其他事物其他境相若相截断,而自形成一文学家心目中之一世界。而此一世界为想象之所摄,情志之所持载,亦如为此情志想象所怀抱,而内在于此情志想象,以与之合为整体的世界。此世界属于文学家之精神主体,即不能纳之于一般所谓公共时空之历史的世界。在唐君毅看来,虽然文学家在从事于某一创作时,可说乃在某处或某时,此处此时亦必属于一般所谓历史之世界。然而当文学家在正从事创作时,并不想到其创作的时间和地点。故此从事创作之时间和地点亦不能在文学意识中存在。于是,文学意识即成超越一般所谓历史意识之一独立的意识,每一文学作品中之世界也就皆自成一独立的整体了。

其三,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中之分类不同。唐君毅认为:“在历史意识中之一人一物一事之属于何类或不属于何类,可纯从其实际上所表现之性质看。又于一人一物一事,如我们已定其属于何类者,则不能更属之于他类,亦无属于某类者能兼属于其他之任何类或一切类之情形。”<sup>[1](226)</sup>如君子之类就非小人之类;人类就不能兼属于鸟兽之类或植物山川之类。由此,史学家所叙述国家政治类之大事便不能夹杂以儿女之私情;同理,关于庙堂礼器之记载亦非关于兵器与战争之器之记载。可见,各种人之类、事之类、器物之类必须严加分别,而为历史上之人、事与物既属于某一类,则不能再谓其属于他类了。“然在文学中,对于各类之人、物与事,则不似史家之就历史事实之真相,而据其性质之不同,与以斩截之划分”<sup>[1](226)</sup>。如我们将历史中之人物纳之于一小说戏剧中,则其初之属于此类者可改而属于他类或兼属他类。而其终究属于何类,唯由小说戏剧家所设定之其人之性格在种种情形当必有之种种发展以为定,于是,此人物即可由其性格之发展而由此一类移入彼一类。比如小说戏剧之叙事,亦恒于一类之事中杂叙他类之事,或于一类之事中,初只叙其隐含不同类或相反类之事,继则叙其如何转而发展为另一不同类或相反类之事,故在叙述国家政治之事时,便可杂以儿女之私情。这就是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中之分类的不同之处。

同时,在唐君毅看来,虽然文学家不能真将一事一人一物所属之类任意加以变化,以使之暂时顿化为一切类或任何类之人物或事,然而文学家必在一方尊重一人或一事一物之原属于某一类之本性的心境下,一方尽量求扩展一人或一事一物所能属之类的幅度。此幅度乃必然远较历史家之就一人或一事一物所实际已表现之性质,以定其所属之类者为宽。此则由于一人或一事一物之本来所可能有之性质之表现,原较其实际表出者为宽,其实际表出者亦原不能代表其内在本性之全之故。文学家于此恒善能透至对各种人与事物之内在的本性之了解,以想象其在种种情形下可能有之当然而必然之表现;而此想象之世界中之人与事物所表现之性质,亦因而远较历史家之就事述事、就人述人、就物述物者,有更大之天地可供驰驱。此亦即一切小说戏剧皆可有其虚构之成分之根本理由所在。至于诗歌散文中,则人固可无对于故事人物之虚构,而初只对人所接触之实境加以叙述,以自寄托抒发其情志。然而人之求使一人一事一物,不只属于一般意识或历史意识中所指定之类,而使之兼属于他类之要求,仍不能断绝。此中,人之满足其要求之道,即为对一类之人物与事,取他类人物与事为比喻,而视如他类之人物与事,以超拔于一般意识与历史意识所指定之类之外,由此以扩大转移其所属之类;而我们上述之欲变化人物与事之类的要求,遂得其另一形态之满足。

其四,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之因果观念不同。唐君毅认为,“文学与历史中之所述之事物之因果关系,原皆同为特殊单独之具体事物间之因果关系”,故“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中对于具体事物之因果关系之观念,又明有不同”<sup>[1](236-237)</sup>。其显而易见者是,历史事实间之因果关系,乃公共时空中所实有之事实之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历史上凡以一事为因,其后必有他事为果。此中由因果相续所成之事之关系,乃为自古及今以迄未来未尝间断者。而文学意识中之事实则多为虚构,不能在公共时空中得其定位,只在文学作品之内在时空中存在;而在此内在时空中之诸事物间之因果关系亦初由文学家之构想而成。此诸事物对此内在时空以外之公共时空中之事物,并无真实的因果关系。因此,在一文学作品完结之处,最后所叙之事物亦更不再生果,其所述之事物之因果相续之关系即不再相续而自然断绝。对此,唐君毅以《红楼梦》为例:《红楼梦》写贾府衰败,宝玉出家以后,于贾府中之人物之后事如何,宝玉出家后念何经书,何时成道等事均无所述。而其后之作者为《红楼》圆梦,续写《红楼梦》,欲于此下文再加以构想,即属于另一文学作品

了。

其五，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之因果的必然性与目的性不同。唐君毅认为，“一般常识及历史意识中，所述之事物之因果关系，乃实然而非当然，偶然而非必然，乃因果相续，必因果相涵，而因果之事之相继中，其间恒有暗昧之处，非互相依赖，彼此透明。而文学所述之事物之因果关系，则恒为当然而必然，因果相涵而互相依赖，以彼此透明者。”<sup>[1](240)</sup>在唐君毅看来，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之所以有此不同，关键在于一切历史之叙述皆以历史事实为历史意识之所对，而自外叙述其在公共时空中之关连。譬如在一纯粹之历史著作中，我们可以叙述武王于某年誓师牧野，于某年灭殷，于某年逝世；周公摄政，于某年禅位成王。此皆为历史意识中所安排于一公共的时空中诸历史事实之外在的叙述。然而我们于此却并不真明白武王何以必要誓师之理由，何以殷必被灭，以及周公必摄政，后又必禅位之理由。而要明白这些史事，只能以史籍之记载为凭，对其作解释与作推论，而后才能了解其历史真相。如果记载之所不及，自非我们之所能知。“故我们于历史上所述之事之相继，如要说其间有因果之关系，恒只能说有因果之相继，而无因果之相涵。而此相继之因果之事之相，乃各自独立，而非互相依赖的，以吾人知其有因，并不能使吾人知其果之当生而必生。”<sup>[1](242)</sup>然而在小说戏剧之叙述中，则我们可说其中所述之事有真正之因果之相涵，其因果之事相间，有真正之互相依赖之关系。而一切事之相继而发生，皆有所先已设定之人物之本性上的理由，而其发生为当然且必然。为什么小说戏剧中人物之事会发展为当然与必然？为什么其前后事间有一因果相涵之情形发生？对此，唐君毅解释说，这是因为小说戏剧中之人物或事皆有一目的性的意义，亦即皆自始依于人之情志之要求而有，即皆以人之情志要求或所怀抱之目的为因，而以依之而有之事为果。此种因果可称为一内在的目的性的因果，而能表现人物之个体性。

在唐君毅看来，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中之因果观念之所以有上述差别，就在于我们对历史中人物之本性不能先知，而至多只能本于已有的对相继之史事的记载而加以解释或加以推知。而小说戏剧家对其所述之人物之本性，则在创作时既已先知，方进而述其在种种情形下必当如何表现，而发展为种种之事。

### 三、文学意识之价值意义

唐君毅认为，所谓文学意识之价值意义，“一是指

此意识之所对之事物之价值意义，一是指此意识本身之价值意义。”<sup>[1](253)</sup>

在唐君毅看来，如从历史意识所对之事物看其价值意义，此除历史意识所对之事物之本身之价值意义与反价值意义外，主要者，即历史上之前事能为因，以导向后果之价值意义。此前因导向后果之价值意义，在本质上为一功效的意义，亦即前事为后事得以发生之条件或工具的意义，而后事又可为更后之事之条件或工具。可见，在历史意识中，因我们注重看前因对后果之工具的意义与功效的意义，又以因果相续之无尽，此工具的意义与功效的意义便无最后的保存之所，而只能保存于为道德意识所支持之历史意识中。而文学意识则不同，文学意识自始为一情志之要求所推动，人之情志要求自始为具道德意义。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人由情志之要求所推动，而想象一故事，或呈现一境界，皆直接以此故事或境界为其内容。而此故事与境界即有其本身内在的价值意义，而另无工具的意义或功效的意义之可说。于是，我们“欲认识文学意识之价值，即只须由推动此文学意识之情志要求，与此意识中之故事与境界之为如何观。此情志要求必有或高或低，或大或小之道德意义之善。情志要求之高低大小，亦即直接决定文学意识之高低，与其所创作之文学作品之高低之一条件。又此故事中之人物之情志及境界中之境物所引起之情志，本为文学家之情志之直接或间接之表现处，故其中之人物境物之价值，即合以构成文学家之创作此作品之整个情志之价值”<sup>[1](257)</sup>。在唐君毅看来，文学意识除了具有道德意义之善之外，还具有道德意义之真与美。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之一故事在分为各段之事时，其前后之间是否真有当然必然之关系，与是否真能因果相涵，以表现一故事之发展及一境界中之各境物，是否真表现一异而同、同而异之关系，以形成一具有有机结构的整体，则为文学作品之有无客观表现的美所系。此各境物所表现之异而同、同而异之关系，又即各境物中之真理。唯此真理非抽象的被了解之真理，而是具体的被体验之真理。

综上所述可见，文学家之情志的道德意义之善乃为其本身所自有的，文学之美的意义与其中所包含之真的意义，则由情志要求之欲表现于故事境界而形成。至此表现于故事境界之美的意义，再主观内在化于人之情志，则为其美的意义，再反照于情志之善的意义，以成为内在的再构造此情志之善且美的意义，使之更充实而有光辉。合此三者即为文学意识所表现的价值意义之全体。

## 四、中国文学之精神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较,中国文学精神之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学重视诗歌散文”<sup>[2](232)</sup>。唐君毅认为,“在西方文学中小说与戏剧之重要性,过于诗歌与散文。在中国文学中,则诗歌与散文之地位,重于小说与戏剧。”<sup>[2](232)</sup>西方文学起源于希腊和罗马,希腊文学即以史诗与戏剧为主,如亚里士多德之《诗学》亦只论此二者。再如希腊最初的历史家赫罗多塔、苏塞底息斯之《历史》只重叙战争;布鲁塔克之《希腊罗马名人传》则多叙述英雄之故事。此二者皆近似小说,而成为西方后代小说之渊源。西方近代之抒情诗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故就整体而言,西方以小说戏剧名之文学家实远多于专以诗文名之文学家。以纯文学而言,在中国最早出现写自然与日常生活之抒情诗者,始见于《诗经》与《楚辞》;而最早写散文者,则始见于《尚书》与《左传》。即使是魏晋隋唐的短篇小说,也皆含有诗意之美与散文之美;宋元以后中国之剧曲亦属诗词之流。可见,西方文学之重小说戏剧与中国文学之重诗歌散文,正表现了中西文学精神之不同。

第二,“中国自然文学中所表现之自然观”之特点<sup>[2](237)</sup>。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学之涉及自然,而能代表西方文化最高精神者,吾人以为是带浪漫主义色彩之诗人,如华兹斯、古律芮已、雪莱、歌德、席勒等之自然诗。”<sup>[2](237)</sup>大体而言,此类西方自然诗除歌颂自然之美外,还皆重视自然中所启示之无限的宇宙生命或神的意旨,使人产生不胜向往与企慕之情。“然中国之自然文学,则所重视者,在观天地之化机、生德、生意。夫天地之化机、生德、生意,与宇宙生命或神之意旨,在哲学道体上,亦可谓之同一物。”<sup>[2](237)</sup>在这里,所谓言其为宇宙生命或神之意旨,则偏重其力量之伟大一面;所谓言其为天地之生机、生德、生意,则偏重于人情味一面。故西方自然文学之赞美自然,恒引人进而赞美上帝;而中国自然文学之赞美自然,是以宇宙之生机、生意,即流行洋溢于目之所遇、耳之所闻,则自然之形色之后,可更无物之本体与神,因而当其透过自然之形色而超越之时,所得之境界遂为一忘我、忘物和忘神之解脱之境界。唯此解脱之境界乃得之于自然,乃仍返而游心于自然,此之谓仙境,具有空灵自在之美。可见,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的自然诗之精神渊源于其宗教精神;中国自然诗之精神渊源于道家和儒家之精神。

第三,“中国文学不长于英雄之歌颂、社会之写实,

而尚豪侠以代英雄”<sup>[2](242)</sup>。唐君毅认为,“中国之自然文学能表现中国文学之特殊精神,而非中国文学之正宗。中西文学之正宗,皆在表现人生社会之文学。”<sup>[2](243)</sup>西方文学在希腊、罗马时代,以《荷马史诗》、《希腊悲剧》和《希腊名人传》最为著名,它们皆重述战争和英雄之性格与事业。西方人歌颂英雄,多述其波澜壮阔之行事,予智自雄之魄力,或一往直前死而无悔之意志,热爱理想,如醉如狂之情感。“然在中国文学中,则西方式之英雄之歌颂、爱情之礼赞、社会之写实,与社会问题之提出,及心理之分析、主义之宣传,皆非其所长。……中国人之所崇拜之人物,乃圣贤豪杰侠义之士,而非英雄。”<sup>[2](243)</sup>在唐君毅看来,英雄向上而向外,圣贤豪杰侠义之士则向上而向内;英雄志锐而一往希高,圣贤豪杰皆胸襟阔大,侠义之士则宅心公正,其磊落不平之气皆只由报不平一念而生。由此可见,高而锐者乃西方精神,宽阔而平顺者乃中国精神,故中国文学无英雄小说之名,中国小说中独重侠义小说一类;中国小说中所写英雄亦皆重其豪杰侠义之精神,而不重其热情与魄力。”<sup>[2](243-244)</sup>

第四,“中国小说戏剧,不重烘托一主角之性格与理想,而重绘出整幅之人间”<sup>[2](245)</sup>。唐君毅认为,西方小说戏剧由重视英雄人物及重视个性之伸展与表现之故,而重视一小说戏剧中主角之地位,以及烘托出一主角之性格与理想及其性格与理想在环境中之发展历程。中国小说戏剧则“无只以烘托一主角之性格与理想为目的者”,“亦非为描写客观对象化之社会,提示社会问题、宣扬主义、教训人生,而唯是绘出一整幅之人间。”<sup>[2](245-246)</sup>这里所谓整幅之人间,是指人与人之间(其中亦可包括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其历史文化之间,但唯以人与人之间为主)的相互关系。在唐君毅看来,中国小说戏剧之好者,皆在所描写之诸人物,所构成之交互之人间关系之全体中,能烘托出一情调、意味或境界。

第五,“中国人间文学中之爱情文学重回环婉转之情与婚后之爱”<sup>[2](247)</sup>。唐君毅认为,在西方文学中,表现男女恋爱之情者,皆重婚前之恋爱,似只有婚前之恋爱乃为恋爱。然而在中国文学中,“婚前之恋爱已不尚追求,不将所爱者过度理想化、神圣化,而推之高。中国人恋爱言恋爱,尤重婚后之爱。”<sup>[2](248)</sup>故中国诗文中之表男女之情者,皆重婉约蕴藉,即在古代有自由恋爱之时,其异性之相求,亦非一往向上追求,乃婉转以起相思。同时,中国爱情文学之好者,实非述男女相求之情,而是述婚后或情定后之生离死别之情。

第六,“中国文学之表情,重两面关系中一往一复

之情”<sup>[2](253)</sup>。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学其用心恒为一往的，而所表之情，均可谓主要见于一面之关系中。如宗教文学只表现人对神的企慕与祈求；浪漫主义文学只表现人对无限境界之向往、英雄之崇拜、婚前爱情之追求。而在中国文学中，“则所表现之情，恒为两面关系的。故其用情、用心，皆为一往一复的，而非一往的。”<sup>[2](254)</sup>如婚后夫妻之情谊则为两面关系。两面关系与一面关系情之不同之处，在于此中两方皆为自动的用情者，两方皆确知对方对我有情谊。而此两方间之情谊遂如两面镜子交光而传辉互照。由此可见，由于中国文学中之重两面关系中之情，因此，中国文学之表情，即一方重婉曲、蕴藉、温柔和敦厚，一方即重情之平正与通达，笔法之老练、苍劲和典雅。

综上所述，唐君毅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人文精神为己任，热心于从事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研

究和宣传。尽管他在对中西文学之比较中，习惯于用本民族的文学标准去观察和评判西方文学，不免带有文学评判价值上的主观片面性。然而，他的文学观却有着独到的理论创新、理性判断和审美情趣，他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唐君毅. 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2] 唐君毅.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On Tang Jun-yi's view on literature

XIONG Lu-ma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ang Jun-yi believed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and he divided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eight parts.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thought that literature had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history and only comparing literature views with the history ones were w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views, the value of which reflec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y.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 literatures, although he was used to observing and judging West literature with his own nationality literature standard, which unavoidably had subjective one sidedness of literature judgment, thus his view on literature had original theory innovation, rational estimation and esthetic sentiment, which still has importan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flourishing socialistic literature and art.

**Key words:** Tang Junyi; view on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West literature

[编辑：颜关明]